

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

邵会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以北方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金属马衔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 对这些马衔的流行年代和区域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通过对中原地区、新疆地区和中国北方以外的欧亚草原地区的材料对比, 对这些马衔的来源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关键词: 先秦时期; 北方地区; 金属马衔; 欧亚草原

中文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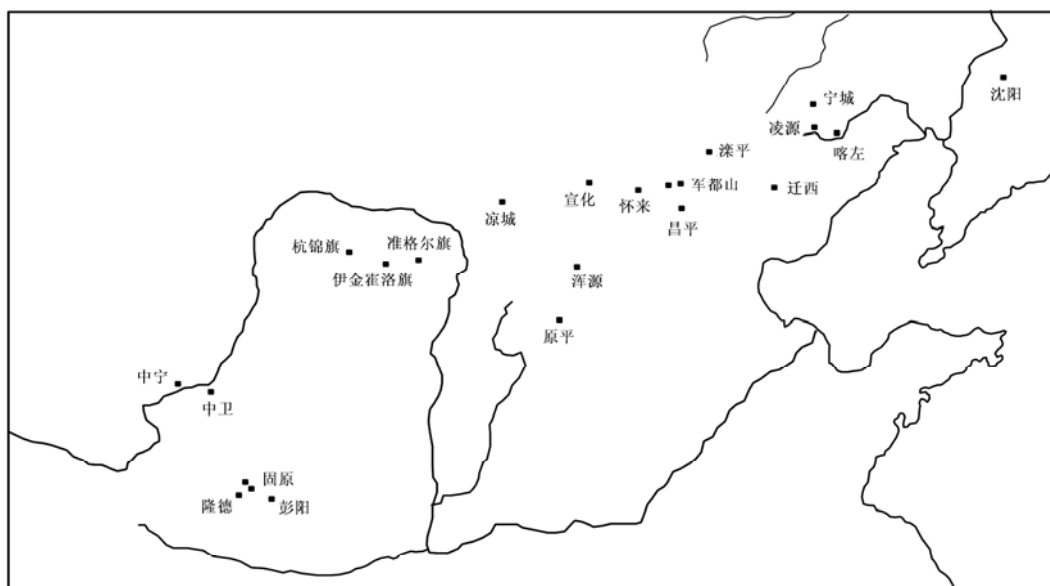
马衔, 俗称“马嚼子”, 又称勒, 金文作“𩇑勒”, 是横勒在马口中的器具, 两端与镡相接^[1],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道:“衔, 马勒口中……行马者也。”总之, 马衔通常被人认为是一种放在马嘴之中的用来驾驭马的器具^[2]。马衔的出现年代应该很早, 有可能是伴随着人类开始对马的驯化而使用的, 但也有可能在最早期的驯马中尚未使用马衔, 人们可能是骑着光背马。但无论如何, 只有当马衔出现了, 人们才能更好的控制马, 骑马术才能得到真正的推广和发展。

马衔从制作原料上可以分为有机质和金属两种, 金属一般包括青铜和铁两种成分, 有机质很有可能包括皮带、绳子等原料, 但由于这些材料不易保存, 在考古发现中很难发现这样的遗存, 我们只能大概的推测其原料。早期的马衔可能都是有机质马衔, 因此由于材料所限, 我们无法确定马衔最早的使用年代。金属马衔出现的较晚, 两端带环的一节式青铜马衔在 BC1600-BC1400 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两节式青铜马衔则在 BC1500 年前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使用, 而青铜马衔在东欧、中欧、西伯利亚和北非等地的出现要晚于 BC1000 年左右^[3]。对于中国来说, 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青铜马衔是出自殷墟西区墓葬中^[4] (图七, 1), 年代大约是在殷墟晚期 (BC13-12 世纪), 中国北方的金属马衔则出现的更晚^[5]。

长期以来, 学者们对中原地区的马衔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6]。而由于北方地区的材料所限, 很少有人详细的研究^[7]。近年来随着大量的材料的发表, 使北方地区的这种研究成为可能, 因此本文以历年来北方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的金属马衔类型学分析为基础, 试图把握北方地区马衔的地区和时代特征, 并通过与中原、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的比较, 对与之相关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历年来北方地区马衔的发现和分布

北方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的金属马衔数量很多, 其中以青铜马衔为主, 这也是我们本文探讨的重点, 而铁制的马衔, 出现的年代较青铜马衔要晚, 形制比较单一, 而且腐蚀的很严重, 出土数量不多, 我们将简略论述。目前在整个北方地区, 除了甘肃和青海地区外, 几乎都有马衔出土, 其中辽西地区、冀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宁夏的银南和固原地区最为集中, 具体分布图见图一。



图一 北方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金属马衔分布图

从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在上述地区大约出土和收集了一百多件的金属马衔，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将它们统一编号列表。（表一）

需要说明的是编号 41 的宁夏固原杨郎墓地的铁马衔，原报告认为是马镳^[8]，其实应该是马衔的一节（如图五，12）。另外除了表一中所列的马衔外，在山西浑源李峪村^[9]和内蒙古水涧沟门^[10]等地也报道有马衔出土，但由于没有发表具体的形制，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二、各种马衔的类型式研究

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马衔大部分为两节直杆式，我们根据内环和外环的形状以及衔杆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以下类型：

A 型 马衔的内环呈水滴型，共分二式：

I 式 衔体较粗，四环均为水滴形，而且内环与外环的大小相似，昌平白浮出土 6 件（图二，1）。

II 式 四环仍为水滴形，但是衔体变长，变细，且其中一节的两环呈垂直方向，宁夏固原征集一件（图二，2）。

B 型 衔体外环形状比较特殊，衔镳一体，宁城小黑石沟出土二件，一件外环两侧都套接兽形环饰（图二，3），另一件一侧呈“T”字形，另一侧接兽形环饰（图二，4）；宁城南山根 M102 出土的一件，外侧亦呈“T”字形，上附有 3 个小环（图二，5）。宁城南山根 M101，两端为十字形倒钩状，倒钩外侧有可以转动的半圆环（图二，6）；

C 型 内环呈圆形或者近圆形，外环为圆角三角形或圆角梯形。分二式：

I 式 外环呈圆角三角形，弦杆较细，宁城天巨泉 1 件（图二，7）

II 式 外环呈圆角梯形，相对于 I 式弦杆变粗，北京龙庆峡 2 件，怀来甘子堡 7 件，延庆军都山 1 件（图二，8—10）。

D 型 内环呈圆形，外环由两个环组成，根据外环的两环是否相通可以分为两式：

I 式 两环相通，有的近似“8”字形，军都山 3 件，山西原平峙峪 2 件，浑源李峪村 6 件，怀来甘子堡 6 件（图三，1—6）。

II 式 外环的两环间不相通，这两个环里面的通常为圆形，通常情况下里面的环要大于外附的

环，外附的环形状多样，有三角形、圆形和梯形等（图四），内蒙古明安木独出土的一件一侧为三角形，一侧为圆形（图四，1），这种马衔发现的数量较多，具体发现情况见表一。

E 型 内环和外环均呈圆形或近圆形，可以分两个亚型：

Ea 型 内环要明显小于外环，从目前的发现看这种马衔的分布范围是最广的，几乎在北方各地区均有发现（图五），其中是以青铜马衔为主（图五，1—11），但几乎所有的铁马衔均属于此类（图五，12—14）。

Eb 型 内环与外环的大小相近，宁夏固原征集一件（图六，1），宁夏彭堡于家庄出土 11 件（图六，2—4）。

F 型 这一类为特殊形制的马衔，在北方地区比较少见，彼此间并无联系，为行文方便故归为在一起。其中沈阳郑家洼子的原报告中的 II 式马衔形制很像三环马镡（图六，5），但报告中说明在出土时其马衔环内插有马镡^[11]，有人认为这是一节式硬马衔，显示出比较原始的特点^[12]。笔者认为这种马衔与 D 型 II 式马衔共存，其形制很特别，故暂归入 F 类。除此之外还有三件，一件是出自内蒙古石灰沟，内环为圆形，外环为水滴形（图六，6）；第二件是出自宁夏隆德县，只发现一节，两端均有一小环（图六，7），这种样式的器物在杨郎墓地也发现一件，报告中称之为马镡^[13]，我们也觉得称之为马镡比较合适，但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暂且存疑；最后一件出自宁城南山根 M102（图六，8），由于外环残缺无法判断其具体形制，因此也归入此类。总的说来北方各地发现的马衔的具体形式划分见表一。

编号	发现地点	数量	标本线图	类型式	资料出处	备注	质地
1	宁城小黑石沟	1	图二，3	B 型	[14]	发掘品	青铜
2	宁城小黑石沟	1	图二，4	B 型	[14]	发掘品	青铜
3	宁城南山根 M102	1	图二，5	B 型	[15]	发掘品	青铜
4	宁城南山根 M102	1	图六，8	F 型	[15]	发掘品	青铜
5	宁城天巨泉 M7301	2	图二，7	C 型 I 式	[16]	发掘品	青铜
6	宁城南山根 M101	1	图二，6	B 型	[17]	发掘品	青铜
7	辽宁喀左	2	图五，5	Ea 型	[18]	发掘品	青铜
8	凌源五道河子	2	图五，6	Ea 型	[19]	发掘品	青铜
9	沈阳郑家洼子	2	图四，4	D 型 II 式	[20]	发掘品	青铜
10	沈阳郑家洼子	2	图六，5	F 型	[20]	发掘品	青铜
11	昌平白浮	6	图二，1	A 型 I 式	[21]	发掘品	青铜
12	张家口泥河子村	1	图四，7	D 型 II 式	[22]	发掘品	青铜
13	北京延庆龙庆峡	2	图二，8	C 型 II 式	[23]	发掘品	青铜
14	滦平梨树沟门	2	图四，14	D 型 II 式	[24]	发掘品	青铜
15	滦平梨树沟门	2	图五，4	Ea 型	[24]	发掘品	青铜
16	河北怀来北辛堡	1	图四，6	D 型 II 式	[25]	发掘品	青铜
17	河北怀来北辛堡	1	图五，1	Ea 型	[25]	发掘品	青铜

18	河北怀来甘子堡	7	图二, 9	C 型 II 式	[26]	清理	青铜
19	河北怀来甘子堡	4	图四, 3	D 型 II 式	[26]	清理	青铜
20	河北怀来甘子堡	2	图四, 2	D 型 II 式	[26]	清理	青铜
21	河北怀来甘子堡	6	图三, 4	D 型 I 式	[26]	清理	青铜
22	河北迁西大黑汀	2	图五, 2	Ea 型	[27]	发掘品	青铜
23	延庆军都山玉皇庙	1	图二, 10	C 型 II 式	[28]	发掘品	青铜
24	延庆军都山西梁堽	1	图三, 2	D 型 I 式	[28]	发掘品	青铜
25	延庆军都山玉皇庙	1	图四, 5	D 型 II 式	[28]	发掘品	青铜
26	延庆军都山玉皇庙	1	图三, 1	D 型 I 式	[29]	发掘品	青铜
27	延庆军都山小西坡	1	图三, 5	D 型 I 式	[30]	发掘品	青铜
28	滦平虎什哈炮台山	1	图五, 3	Ea 型	[31]	发掘品	青铜
29	内蒙古石灰沟	1	图六, 6	F 型	[32]	发掘品	青铜
30	内蒙古明安木独	1	图四, 1	C 型 II 式	[33]	发掘品	铁
31	内蒙古西沟畔	1	图五, 13	Ea 型	[34]	发掘品	青铜
32	凉城毛庆沟	1	图五, 11	Ea 型	[35]	发掘品	青铜
33	内蒙古桃红巴拉	2	图五, 9	Ea 型	[36]	发掘品	青铜
34	鄂尔多斯地区	1	图五, 10	Ea 型	[37]	采集品	青铜
35	鄂尔多斯地区	1	图四, 16	D 型 II 式	[37]	采集品	青铜
36	山西原平峙峪	2	图三, 3	D 型 I 式	[38]	发掘品	青铜
37	山西浑源李峪	6	图三, 6	D 型 I 式	[39]	发掘品	青铜
38	宁夏固原河川阳洼	2	图四, 12	D 型 II 式	[40]	发掘品	青铜
39	宁夏固原杨郎	3	图四, 13	D 型 II 式	[41]	发掘品	青铜
40	宁夏固原杨郎	5	图五, 7	Ea 型	[41]	发掘品	青铜
41	宁夏固原杨郎	2	图五 12、14	Ea 型	[41]	发掘品	铁
42	宁夏固原	1	图二, 3	A 型 II 式	[42]	采集品	青铜
43	宁夏固原	1	图六, 1	Eb 型	[42]	采集品	青铜
44	宁夏彭阳米塬村	2	图四, 15	D 型 II 式	[43]	发掘品	青铜
45	宁夏彭阳店洼村	2	图五, 8	Ea 型	[43]	发掘品	青铜
46	宁夏彭堡于家庄	11	图六, 2-4	Eb 型	[44]	发掘品	青铜
47	宁夏中卫县	10	图四, 8-10	D 型 II 式	[45]	发掘品	青铜

48	宁夏中宁县	2	图四, 11	D 型 II 式	^[46]	发掘品	青铜
49	宁夏隆德县	1	图六, 7	F 型	^[47]	清理品	青铜

表一 先秦时期北方地区出土金属马衔一览表

上述的分类需要说明的是 A 型的各式划分是借鉴了中原地区马衔的划分方法^[48], 因为 A 型马衔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比较多, 有完整的发展序列; 而其他类型马衔以前的研究很有限, 有人对军都山地区出土的马衔划分为连续发展的三种形式早期^[49], 即本文的 C 型、D 型 I 式和 II 式。我们认为这种演变是很有可能, 尤其是 D 型 I 式和 II 式, 但是对于 C 型与 D 型之间的演变存在着一些问题, 因为在怀来甘子堡墓地 M8 中同时出土了 C 型和 D 型 II 式 (图二, 9 和图四, 3), 表明二者很有可能同一时代使用; 从功能上来看二者是有区别的, C 型马衔在使用时, 缰绳和马镫都连在相同一个环中, 而 D 型马衔外环上外附一个专门用来连接缰绳的环; 另外从欧亚草原的资料来看, C 型马衔逐渐发展成马镫型马衔^[50] (如图八, 2、3), 在中国北方却尚未发现这种马衔, 当然这或许说明 C 型马衔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由于资料有限, 我们暂且存疑, 等以后有充足的证据再详细论证。

三、各类型马衔流行年代及分布地域差别的探讨

各类型马衔在北方各地出现的年代, 我们主要从其共存的器物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判断。A 型 I 式仅在昌平白浮发现, 白浮的墓葬年代原报告认为是西周早期^[51], 但林沅先生根据出土的鬲的形制认为其年代应该在西周中期甚至更晚^[52]。A 型 II 式仅在固原地区征集一件, 没有共存的器物可以断代, 不过在琉璃河燕国墓地西周早期墓葬^[53]和西安张家坡墓地西周中期偏早的墓葬中^[54]均有形制相似的马衔发现 (图七, 3、4), 其实 A 型 I 式和 II 式均是西周晚期以前中原地区流行的形制^[55]。

B 型马衔均出自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中, 年代均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56]。

C 型 I 式宁城天巨泉 M7301 一件 (图二, 7), 年代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 C 型 II 式仅在冀北的延庆军都山、龙庆峡和怀来甘子堡墓葬出土 (图二, 8—10), 其年代应该在春秋中期或者更晚^[57]。

D 型 I 式原平峙峪出土两件, 根据发掘报告其墓葬的年代大约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58]; 浑源李峪村出土的 6 件, 根据高去寻先生的考证李峪村墓地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59]; 而军都山出土的该型马衔年代在春秋中期^[60], 而怀来甘子堡墓地的年代也应在春秋中期—春秋晚期之间。D 型 II 式发现的数量较多, 沈阳郑家洼子 M6512 年代原报告定在春秋末到战国初^[61], 但根据共存的东北系短剑形制, 年代定在春秋晚期比较合适^[62]; 其他的在冀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和宁夏固原地区的发现看, 该型式马衔在北方流行的年代应该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 但在怀来北辛堡和固原杨郎墓地的发现说明该形式马衔可以延续到战国中期甚至更晚^[63]。

Ea 型马衔发现的数量最多, 从各地的发现看这种形制的马衔没有早于春秋晚期的, 而且在北方地区铁器时代还继续流行。Eb 型仅在固原地区发现, 从于家庄墓地看, 其年代应该在春秋战国之际^[64]。

至于 F 型马衔由于是一种暂时的划分, 而且在北方地区发现的数量较少, 我们在这里就暂不讨论其年代。

上面的分类是打破各地区的限制, 但当将这些经过分类后的马衔还原于各地区时, 我们发现北方地区各种形制马衔的分布存在着一些地域性的差异, 首先我们看一下各地区马衔具体的形制。(见表二)

地 区	辽西及沈阳地区	冀北及山西地区	内蒙古中南部	银南和固原地区
流行年代				

西周中期或者更晚		A 型 I 式		
西周晚期以前?				A 型 II 式
西周晚期—春秋早期	B 型			
	C 型 I 式			
春秋中期—春秋晚期		C 型 II 式		
春秋中期—战国早期		D 型 I 式		
春秋中期—战国中期甚至更晚	D 型 II 式	D 型 II 式	D 型 II 式	D 型 II 式
春秋晚期以后	Ea 型	Ea 型	Ea 型	Ea 型
春秋晚期—战国早期				Eb 型

表二 北方各地区出土马衔所属形制及流行年代一览表

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D 型 II 式和 Ea 型马衔在各地区都有发现外，其他形制的马衔的地区分布的差别都很明显：A 型 I 式仅在昌平一地出现；B 型和 C 型 I 式马衔仅在辽西地区发现；C 型 II 式唯有在冀北和山西地区存在；Eb 型马衔和另外一件征集的 A 型 II 式马衔仅在宁夏固原地区出现。如果再结合流行年代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各地区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减小，在春秋中期以前各地马衔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在内蒙古中南部和宁夏银南和固原地区甚至还没有金属马衔的出现^[65]，到春秋中晚期以后各地都流行使用 D 型 II 式和 Ea 型马衔，形制趋于统一，只有固原地区出现了 Eb 型马衔，可以看作是一种地区的特色，但这种马衔的影响能力很有限，在战国中期以后，Ea 型成为马衔的北方地区马衔的主导形制，除了 D 型 II 式马衔还有少量的分布外，其他形制的马衔都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北方各地区马衔形制的逐渐趋同很有可能与东周时期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D 型 I 式马衔只有在山西北部 and 冀北地区发现，这暗示了两地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实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两地间存在着人群的流动，桑干河谷则是他们联系的通道，而这种 D 型 I 式马衔很有可能就是狄人所使用的^[66]。

当然，目前关于马衔的考古材料很有限，表二中的各地马衔分布很有可能存在不足，笔者这里仅是提供一种推测，还需要大量的考古材料来证实。另外，我们目前要想将这些马衔完全还原到每个考古学文化中，进行具体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比较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文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四、北方地区金属马衔起源的探索

从上面的分析看，北方地区发现的 A、B、C、D 和 E 型这四种类型的马衔很难排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因此这些马衔应该有不同的来源，至少可以肯定这些马衔不是起源于同一地区。下面我们就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马衔的比较分析来探寻北方地区各种类型马衔起源的线索。

1、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的马衔有着一套完整的发展序列，从内环和外环均为水滴形（图七，1—4），到内环为水滴形，外环变成圆形或方形（图七，5、6），后来四环全部变成圆形或椭圆形，而且内环要明显小于外环（图七，7—9）。从具体年代上看，中原地区在西周晚期以前主要流行四环均为水滴形的马衔，从西周中期开始就出现了内环呈水滴形，外环呈圆形或方形，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就发现了内外环均为圆形，且内环较小的马衔，而这种形制的马衔逐渐发展，成为后来中原地区马衔中的主要形制^[67]。与中原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的马衔则没有完整的发展序列，而且形制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各种形制显示了不同的来源。其中 A 型马衔二种形式（即 A 型 I 式、A 型 II 式），在中原地区西周晚

期以前都很常见（图七，1—4），其形制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几乎没有差别，而且发现数量很有限，很有可能是中原人携带的^[68]。B 型马衔衔镳一体，总体上看来与中原地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宁城小黑石沟出土的一件（图二，3）衔体形制与 A 型 I 式非常相似，另外在宁城小黑石沟和南山根发现的两件马衔内环均为水滴形（图二，4、5），这一特征也显示了与中原的联系（图七，5、6）。总的说来，B 型马衔仅在辽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发现，数量较少，应是受中原地区马衔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地域和文化特征。Ea 型马衔是中原地区东周时期金属马衔的主要形制，这种马衔在北方地区出现的时间要晚于中原地区，而且两地形制趋同，很有可能北方地区的这种马衔也是受中原的影响而产生的，东周时期中原势力的向北扩张，则或许是这种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当然我们也不能绝对的排除这种马衔是欧亚草原地区起源的可能，虽然欧亚草原地区 Ea 型马衔出现的时间并不早，但毕竟中原的骑马术和马车都很有可能是从欧亚草原传入的，而且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应该是首当其冲的^[69]，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种推测。另外中原地区基本不见北方地区的 C 型和 D 型马衔，这或许说明这两种类型的马衔不是来源于中原地区，至于宁夏固原等地发现的 Eb 型马衔虽然在中原地区也很少见，但从形制上看，应该是受 Ea 型马衔影响而产生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当然在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墓地中^[70]也发现了一些形制特殊的马衔（图七，10、11），但是从考古材料看，这些马衔发现数量不多，而且也没有广泛的流行，因此在这里就不把这些马衔作为比较的对象。

2、中国北方以外的欧亚草原地区^[71]

欧亚草原西起多瑙河，东至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是联系欧亚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联系很早就开始了，“春秋中期起，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吸收了斯基泰—塔加尔青铜器的主要成分，并在长城地带迅速传播”^[72]，这种交流和传播应该包括金属马衔。在整个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发现的金属马衔形制比较丰富，有一些形制的马衔在中国北方地区是不见的（图八，1—9），但也有很多是与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金属马衔形制很相似的，具体说来，其中包括本文所分的 C 型（图八，11、12）、D 型 II 式（图八，13、14）和 Ea 型（图八，15、16）马衔，如此众多的形制相似的马衔，表明了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地区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我们很难说清楚这些马衔具体是那里起源的，从目前的发现看，D 型 I 式马衔仅在冀北和山西北部地区发现，虽然在欧亚草原也发现了形式相近的马衔（图八，10），但从发现的数量和两者马衔形制区别看，C 型 I 式马衔很有可能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冀北和山西北部地区；C 型马衔在前斯基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73]（图八，12），年代应该落在在公元前 8 世纪以前，在塔加尔文化中发现的 C 型马衔年代已经很晚了^[74]（图八，7），而对于中国北方地区来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一件 C 型 I 式马衔（图二，7），在年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75]（公元前 9—8 世纪），北方地区发现的 C 型 II 式马衔也都在春秋中晚期左右，所以我们只能说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具体说何地起源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D 型 II 式马衔仅在欧亚草原的东端发现（南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北方等地区），在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流行的另外一种外环附有一环的马衔，都是外环的两环中外侧的要大于内侧的（图八，4、7、8），这一点与 D 型 II 式马衔是有区别的，因此 D 型 II 式马衔很有可能就是起源于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至于 Ea 型马衔，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北方地区很可能是受中原的影响而产生的，这种形制的马衔在欧亚草原地区也有广泛的分布，由于 Ea 型马衔在各地区都有大量的发现，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哪一件最早，而且这种马衔很有可能不是起源于一个地区的，因此本文只是提供一种推测。

3、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的考古材料笔者了解的很有限，但从一些发表的资料来看，其马衔的主要形制是类似蝇拍形（图九，1、2），这种马衔非常有特点，在长城沿线的北方地区根本不见类似的形制，但在欧亚草原的萨卡（Saka）文化中发现了类似形制的马衔（图八，5）；另外在新疆的和静县也发现了其他形制的马衔（图九，3—5）。其中外环呈马镫形的马衔（图九，3）在黑海北部的斯基泰文化中非常流行（图八，2）；而察吾乎四号墓地出土了一件马衔（图九，4）与图瓦的阿赞（Arzhan）王冢中出土的马衔形制非常相似（图八，4）；另外还有是中原、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周时期都比较常见的形制（图九，5）。根据察吾乎墓地的发掘报告来看，这些马衔的年代在距今 3100—2500 之间^[76]，其

中 Ea 型马衔（图九，5）出于墓地的晚期墓葬中。总的看来，这里的马衔形制与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很有限，两个地区只有在晚期都出现了那种 Ea 型的马衔，而其他形制的马衔可能是没有联系的，这可能与地形有关，高山和沙漠或许阻碍了北方地区 and 新疆地区的联系。另外，在甘肃和青海地区没有发现马衔，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疆地区与北方长城沿线联系是很薄弱的。

从上面的分析看，北方地区的 A 型马衔很有可能直接来源于中原；B 型马衔应该是受中原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具有自身的地域文化特点；Ea 型马衔已经与中原的同类马衔形制趋同，两者几乎没有差别，而 Eb 型马衔应是在中原 Ea 型马衔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马衔，但是流行的时间和地域都很有限；C 型马衔和 D 型马衔在中原地区几乎不见，但与欧亚草原地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 D 型 I 式仅在冀北地区和山西北部发现，可能是属于北方地区自身起源的形制，D 型 II 式马衔则可能产生于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

五、相关问题的讨论

马衔通常都是与马镫配套使用的，但是马镫的形制要比马衔丰富的多，对于它们之间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在很多人都讨论过^[77]，一些报告中根据发掘资料也进行过复原^[78]。其实，虽然马衔和马镫的形制多样，但二者的连接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衔镫一体，二者铸在一起（图十，1）。

第二种，马镫的一侧有扣，扣与马衔的外环相连（图十，2）

第三种，马镫的中心或一侧有孔，衔被纳入其中（图十，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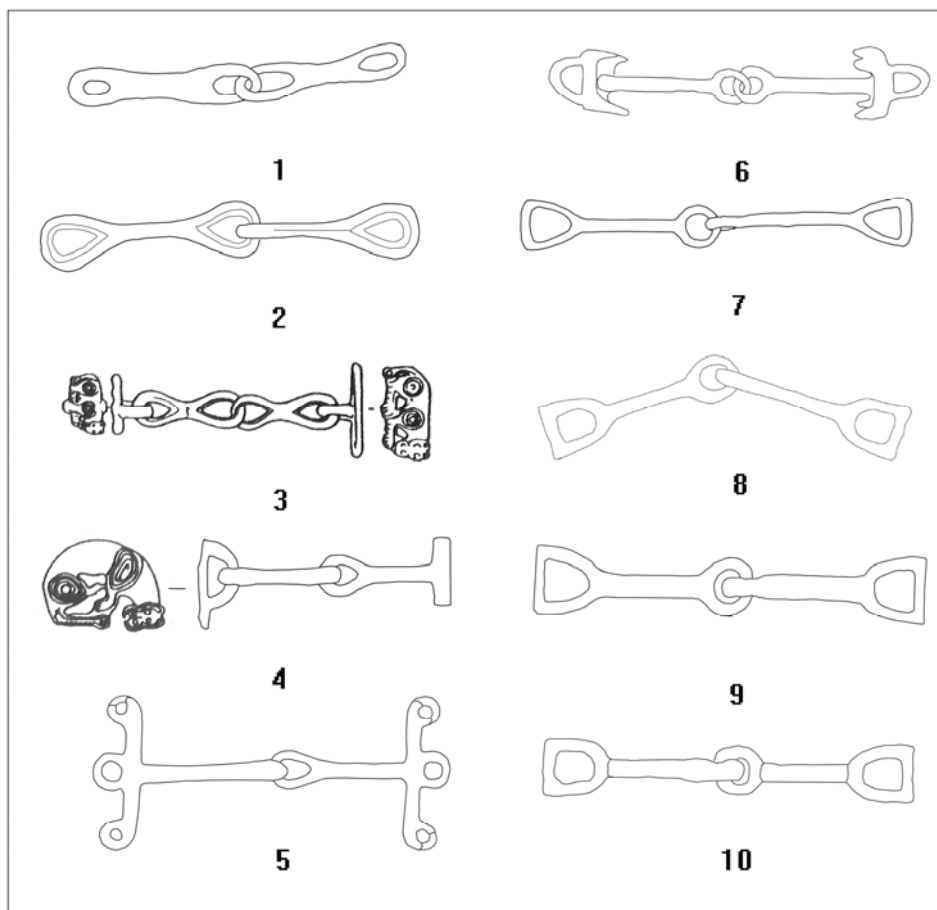
第四种，马镫的中部有一突起，衔环挂上面（图十，5）

第五种，马镫插在马衔的外环中（图十，6）

从我们上面的所分北方地区的各种形制的马衔来看，应该以第五种形式的连接方法为主，C、D 和 E 型马衔的可能都是这种连接方式，这主要是从共存的马镫的形制来看的，另外还有的马衔在出土时，外环内还插着马镫^[79]；同时也存在前三种的连接方式，但数量都较少，只有 A 型马衔才使用这三种连接方式；至于第四种连接方法，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还没有发现可以确定的例子，这里所提供的连接方法只是一种概括，要说明更具体的连接方式则需要对马镫进行详细的分类，在本文中就不详细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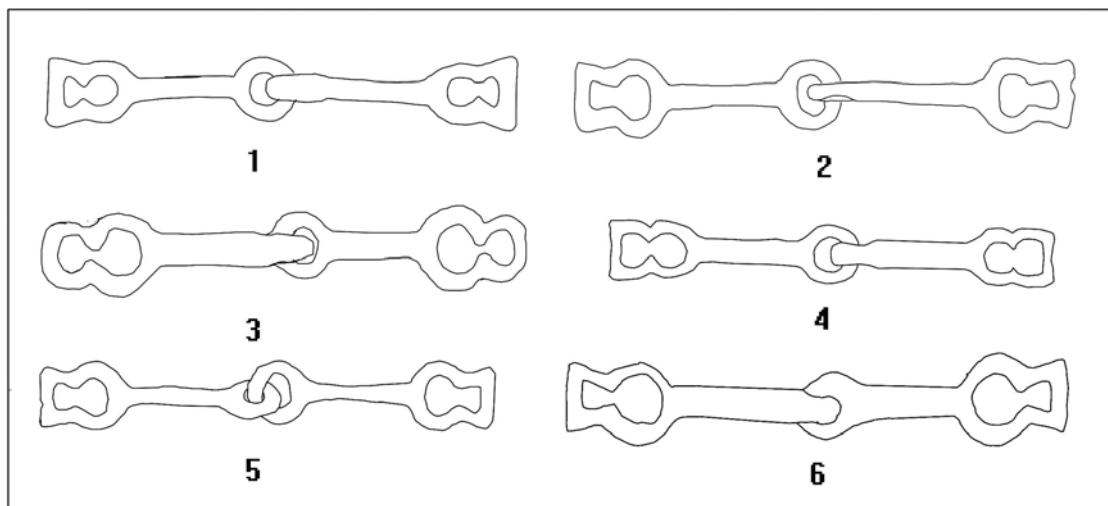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有的墓地中金属马衔的数量要远远低于与之相配对的马镫的数量，如昌平白浮墓^[80]，还有一些墓地中只发现马镫，而不根本不出金属马衔，如玉隆太墓地^[81]；反之也有一些墓葬中马衔的数量要多于与之配对的马镫的数量，而且这种现象在北方地区金属马衔出现之后一直存在，从这一点看，先秦时期的北方地区应该存在着一定数量甚至是大量的非金属马衔，这或许说明在当时社会中金属还是比较珍贵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金属马衔，许多人使用的仅是造价低廉、制作简单的皮条等有机质马衔，因此我们无法单纯依靠出土金属马衔或马镫的数量来判断一个地区或文化畜牧或者游牧的程度，这也正是文中没有能够进行这方面探讨的原因，但我们认为对于马衔的研究可以作为这种研究的一个参照。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杨建华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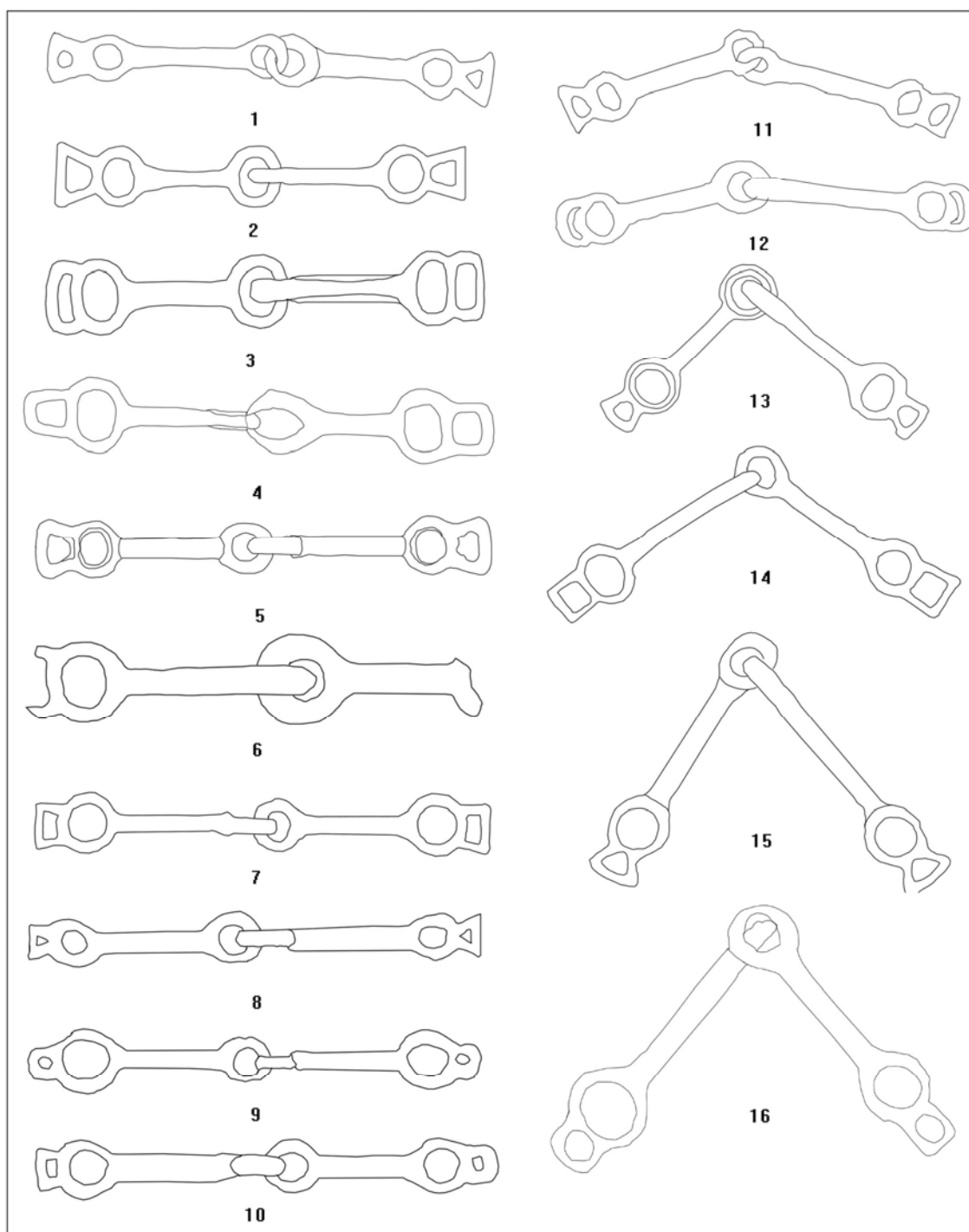
图二 A 型、B 型和 C 型马衔

1、A 型 I 式（昌平白浮 M2: 52） 2、A 型 II 式（宁夏固原采集） 3—6、B 型（3、4 出自宁城小黑石沟、5 出自宁城南山根 M102、6 出自宁城南山根 M101） 7、C 型 I 式（天巨泉 M7301） 8—10、C 型 II 式（龙庆峡 M36: 8、怀来甘子堡 M8: 26、军都山玉皇庙 M18）（均为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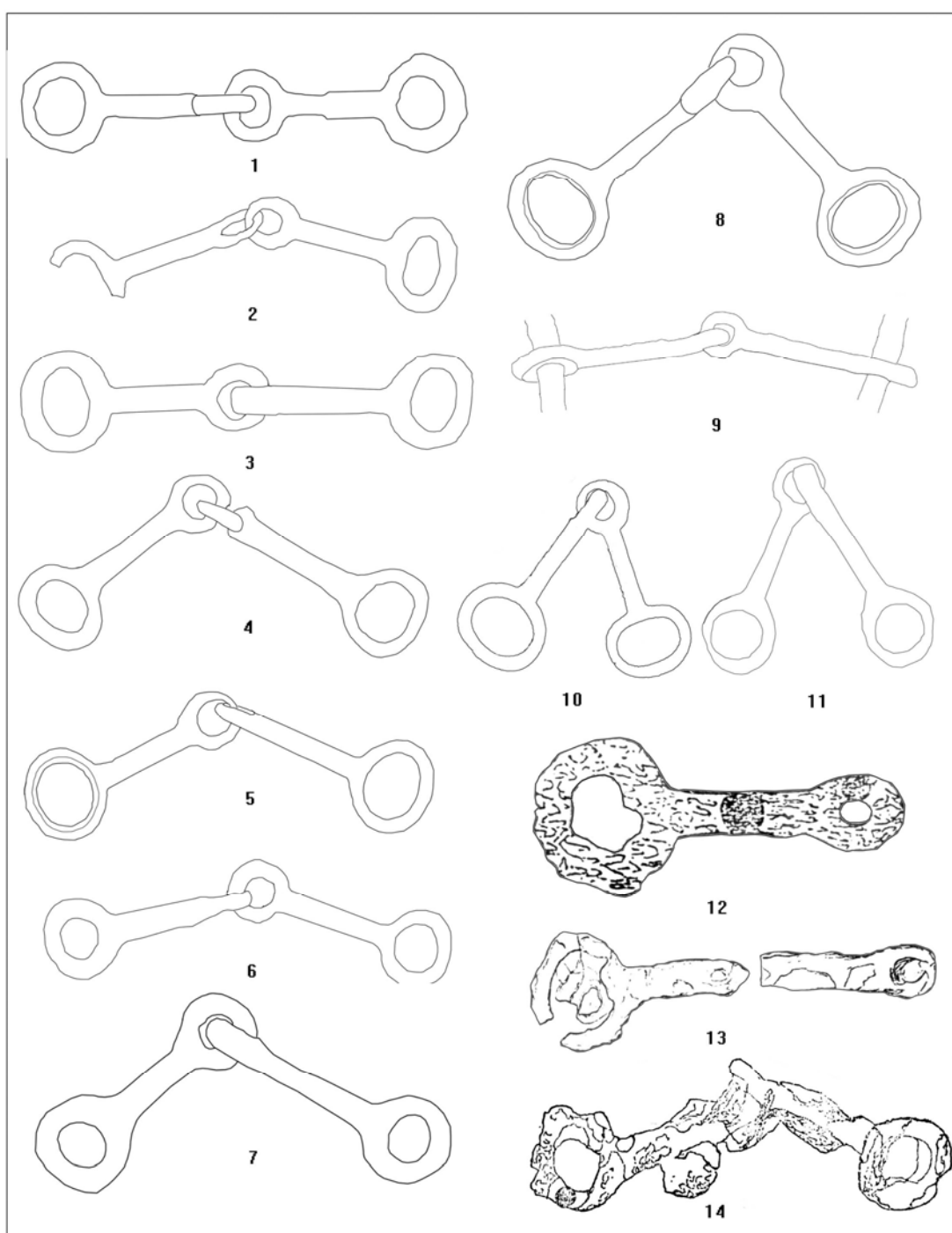
图三 D 型 I 式马衔

1、军都山玉皇庙 M250 2、军都山西梁堽 M1 3、山西原平峙峪 4、怀来甘子堡 5、军都山小西坡 6、山西浑源李峪（均为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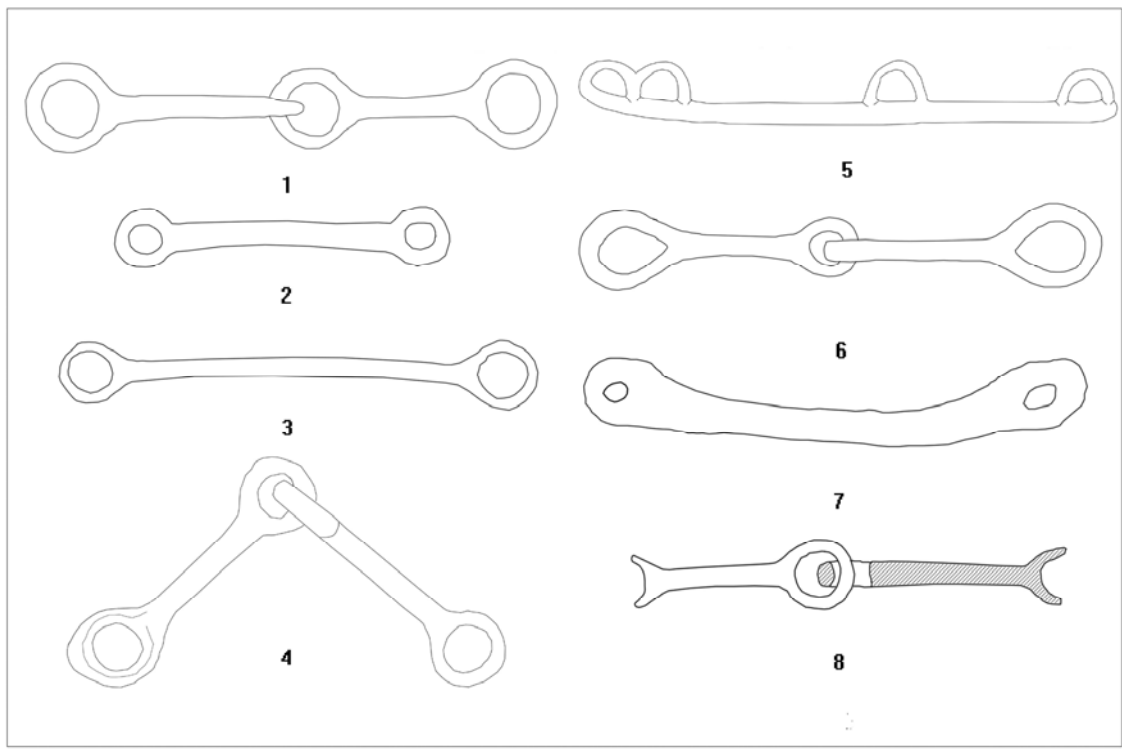
图四 D型 II 式马衔

1、内蒙古明安木独 2、3（怀来甘子堡 M5：4、M8：7）4、沈阳郑家洼子 M6512 5、军都山 YYM174 6、怀来北辛堡 M1：69 7、宣化泥河子村 8—10、宁夏中卫狼窝子坑（M2、M5、M3）11、宁夏中宁 12、固原河川阳洼 13、宁夏杨郎墓地 IM11 14、滦平梨树沟门 L1668 15、宁夏彭阳米塬村 16、鄂尔多斯采集（E1654）（均为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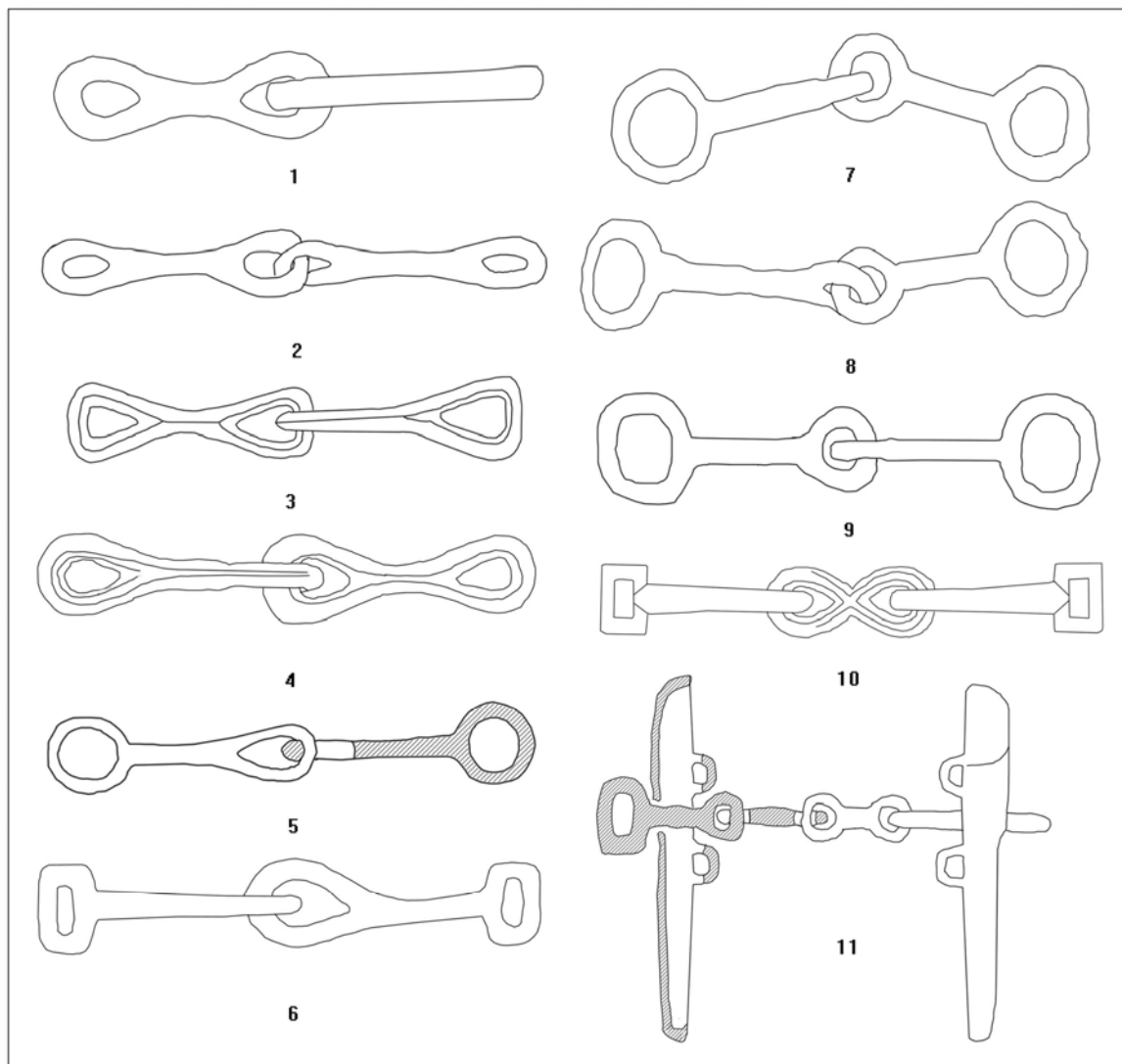
图五 Ea 型马衔

1、怀来北辛堡 M1 2、河北迁西大黑汀 3、滦平虎什哈炮台山 4、滦平梨树沟门 L1668-1 5、喀左南洞沟 6、凌源五道河子 7、宁夏杨郎墓地 IM18: 39 8、彭阳店洼村 DW: 05 9、内蒙古桃红巴拉 M1 10、鄂尔多斯采集 (E1653) 11、凉城毛庆沟 M59: 3 12、宁夏杨郎墓地 M4 13、西沟畔墓地 14、宁夏杨郎墓地 M5: 22 (1—11 为青铜, 12—14 为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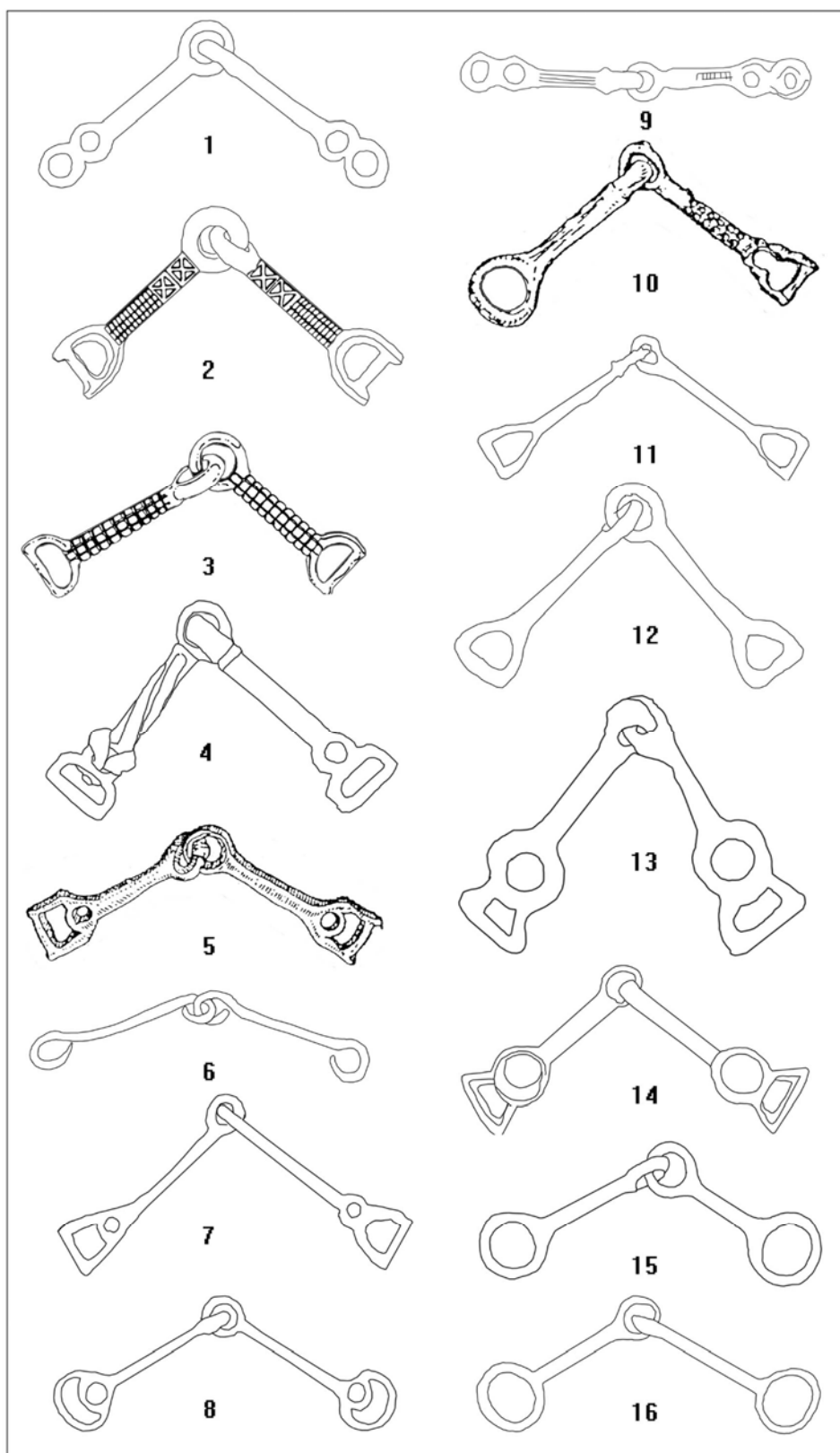
图六 Eb 型和 F 型马衔

Eb 型：1—4（宁夏固原采集、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 NM2 、 SM5 、 SM2）；F 型：5—8（5、沈阳郑家洼子 M6512 6、内蒙古石灰沟 7、宁夏隆德县 8、宁城南山根 M102）（均为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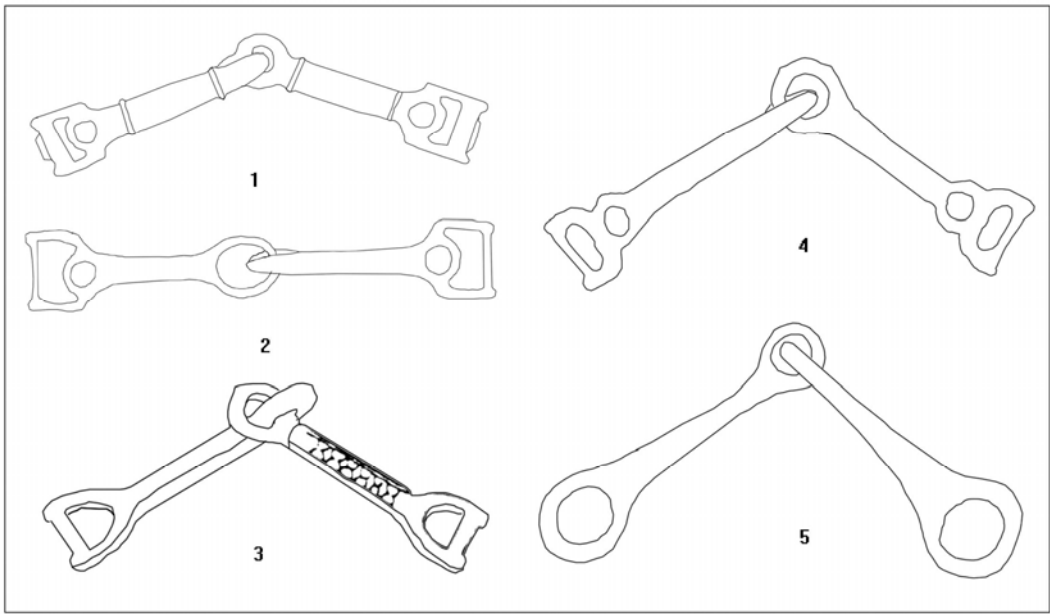
图七 中原地区的金属马衔

1、殷墟西区墓地 M1613 2、张家坡 168 二车马坑 3、琉璃河燕国墓地 M22: 14 4、西安张家坡墓地 M183; 57 5、天马曲村 M5189: 33 6、扶风强家村 M1: 32 7、洛阳中州路 M2415: 12 8、洛阳中州路 M115: 48a 9、虢国墓地 M2717: 204 10、西安张家坡墓地 M152: 12 11、宝鸡茹家庄 M1 (均为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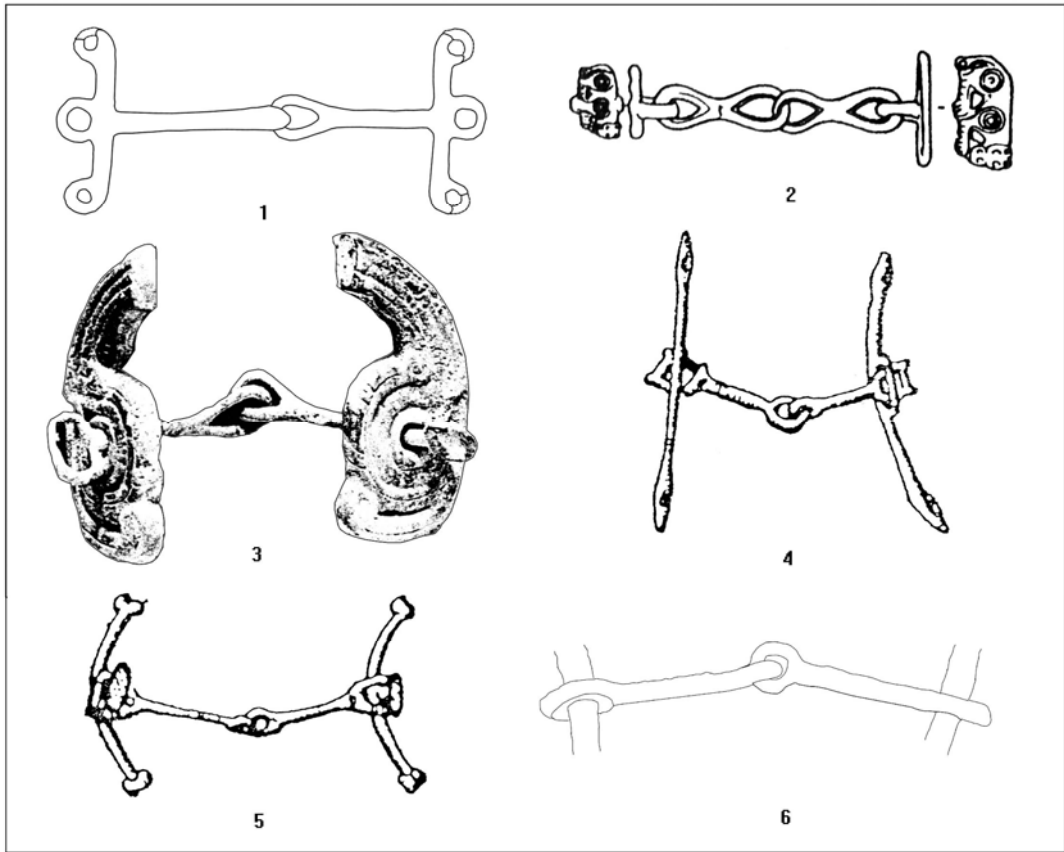
图八 中国北方以外的欧亚草原地区的马衔

1. 9. 12、前斯基泰文化(Zhabotin M2、Ryzanc、Zhabotin M2) 2—3、早期斯基泰文化(Kelermes Schulz M3) 4. 10、图瓦 Arthan 王冢 5、萨卡文化(Saka) 6、早期萨尔马提亚文化(Sarmatian) 7. 8. 11. 14. 16、塔加尔文化 13、外贝加尔地区 15、蒙古采集 (6 为铁器, 其余均为青铜)



图九 新疆地区发现的金属马衔

1、新疆察吾乎五号墓地 M10 2、新疆察吾乎一号墓地采集 3、新疆群巴克墓地 4、察吾乎四号墓地 M114 5、察吾乎四号墓地 M8 （均为青铜）



图十 马衔与马镳连接示意图

1、宁城南山根 M102 2、宁城小黑石沟 3、琉璃河燕国墓地 M205: 33 4.5 萨卡文化 (Saka) 6、内蒙古桃红巴拉墓地

[1]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312.

[2] 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294.

[3] 翟德芳. 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 [J]. 华夏考古, 1988, (1): 95-106.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9, (1): 27-146。
- [5] 翟德芳. 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J]. 华夏考古, 1988, (1): 95-106。
- [6] 吴晓筠. 商至春秋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J]. 古代文明, 2002, (第1卷): 180-277. 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294。
- [7] 翟德芳. 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和马镳略论[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4, (第三期): 33—38。
- [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6。
- [9] 浑源李峪的材料有二批,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J]. 考古, 1983, (8): 695—700. 文中提到有两件马衔出土, 但具体形制未发表. 张颌. 浑源彝器拾遗[A]. 文中介绍两件马衔. 商承祚. 浑源彝器图[A]. 文中发表一件马衔, 梅原未治. 战国式铜器の研究[A]. 发表了三件马衔. 引自李夏廷. 浑源彝器研究[J]. 文物, 1992, (10): 61—75。
- [10] 郑隆. 土默特旗水涧沟门出土铜器[A].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2: 59。
- [11] 沈阳市故宫博物院,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 考古学报, 1975, (1): 141—156。
- [12] 翟德芳. 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和马镳略论[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4, (第三期): 33—38。
- [1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36。
- [14] 赤峰市博物馆, 宁城县文物管理所.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J]. 文物, 1995, (5): 4-22。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东北工作队. 宁城南山根 M102 号石椁墓[J]. 考古, 1981, (4): 304-308。
- [16] 宁城县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北考古专业. 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J]. 文物资料丛刊, 第9辑: 23—58。
- [17]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J]. 考古学报, 1973, (2): 27-40。
- [18] 辽宁省博物馆, 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J]. 考古, 1977, (6): 373-375。
- [1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9, (2): 52-61。
- [20] 沈阳市故宫博物院,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 考古学报, 1975, (1): 141—156。
- [2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J]. 考古, 1976, (4): 246-258。
- [22] 张学武, 陶宗冶. 河北张家口市泥河子村出土一批青铜器[J]. 文物, 1983, (7): 94-95。
- [2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龙庆峡别墅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墓葬[J]. 北京文物与考古, 1994, 第四辑: 32-45。
- [24] 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滦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J]. 文物春秋, 1994, (2): 15-30。

- [2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J]. 考古, 1966, (5): 231-242.
- [26] 贺勇, 刘建中. 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葬[J]. 文物春秋, 1993, (2): 23-40.
- [27] 唐山市文物管理所. 河北迁西县大黑汀战国墓出土器物[J]. 文物, 1992, (5): 76-78.
- [28] 靳枫毅. 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与主要器物特征[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 (1): 61-73.
- [29] 靳枫毅. 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A].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94-214.
- [3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0: 图版十九
-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承德地区文化局, 滦平县文物管理所. 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掘[J]. 文物资料丛刊, (7): 67-74.
- [3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 91-96.
- [33] 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管理所,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J]. 文物, 1992, (5): 79-81.
- [34]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西沟畔匈奴墓[J]. 文物, 1980, (7): 1-10.
- [35]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毛庆沟墓地[A].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7-315.
- [36] 田广金. 桃红巴拉的匈奴墓[J]. 考古学报, 1976, (1): 131-144.
- [37] 田广金, 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83.
- [38] 戴遵德. 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J]. 文物, 1972, (4): 69-71.
- [39] 李夏廷. 浑源彝器研究[J]. 文物, 1992, (10): 61-75.
- [40] 钟侃, 韩孔乐. 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A].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203-213.
- [4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6.
- [42] 罗丰, 韩孔乐. 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0, (5): 403-418.
- [43] 杨守国, 孙悦章. 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9, (12): 28-37.
- [4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J]. 考古学报, 1995, (1): 79-108.
- [45] 周兴华. 宁夏中卫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J]. 考古, 1989, (11): 971-980.
- [46]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 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987, (9): 773-777.
- [47] 隆德县文管所, 王全甲. 隆德县出土的匈奴文物[J]. 考古与文物, 1990, (2): 5-7.
- [48] 吴晓筠. 商至春秋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J]. 古代文明, 2002, (第1卷): 180-277. 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294.
- [49] 靳枫毅. 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A].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94-214.
- [50] Georg Kossack. On the Origins of the Scytho-Iranian animal style[A]. Bernhard

Hansel.Towards Translating the past[C].Berlin, German: 1998, 39 – 96.

[5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J].考古,1976,(4): 246-258。

[52] 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A].林沄学术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89-295。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R].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18。

[5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燕国墓地[R].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220。

[55]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294。

[56] 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0,(4): 451-500。

[57] 杨建华.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形成初探[J].燕京学报,2003,新十四期: 147-192。

[58] 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J].文物,1972,(4): 69-71。

[59] 高去寻.李峪出土青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四分):

[60] 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A].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94-214。

[61] 沈阳市故宫博物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学报,1975,(1): 141-156。

[62] 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A].林沄学术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21.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1087。

[63] 杨建华.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形成初探[J].燕京学报,2003,新十四期: 16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考古学报,1993,(1): 13-56。

[6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J].考古学报,1995,(1): 79-108。

[65] 仅在固原地区采集一件这个时期的马衔,通过对比我们认为这件马衔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而不是本地制造的。

[66]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A].中国钱币论文集[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94-105.杨建华.再论玉皇庙文化[J].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 154-163。

[67] 吴晓筠.商至春秋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J].古代文明,2002,(第1卷): 180-277。

[68] 这里除了[60]所提的固原地区采集的一件马衔外,昌平白浮出土的马衔也很有可能是中原直接传入的,因为白浮墓的葬俗与中原几乎无异,我们认为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受北方深刻影响的中原人。

[69]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J].燕京学报,2003,(新十四期): 95-146。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R].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18.宝鸡弓鱼国墓地[A].引自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365。

[71] 欧亚草原地区的材料主要引自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考古学报,2002,(4): 437-470. Georg Kossack.On the Origins of the Scytho—Iranian animal style[A]. Bernhard Hansel.Towards Translating the past[C].Berlin, German: 1998, 39 – 96. Jeannine Davis—Kimball, Vladimir A.Bashilov, Leonid T.Yablonsky.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ion

age[C].Berkeley, Ca: Zinat Press, 1995。

[72] 林沅.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J]. 燕京学报, 2003, (新十四期): 128。

[73] Georg Kossack. On the Origins of the Scytho—Iranian animal style[A]. Bernhard Hansel. Towards Translating the past[C]. Berlin, German: 1998, 39 – 96。

[74] 乌恩.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 考古学报, 2002, (4): 437–470。

[75] 刘国祥.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J]. 考古学报, 2000, (4): 451–500。

[7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R].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283 – 284. 吕恩国, 常喜恩, 王炳华.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A]. 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72 – 193。

[77] 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295。

[78] 沈阳市故宫博物院,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 考古学报, 1975, (1): 141 – 156。

[79] 田广金. 桃红巴拉的匈奴墓[J]. 考古学报, 1976, (1): 131–144。

[80]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J]. 考古, 1976, (4): 246–258。

[81] 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J]. 考古, 1977, (2): 111–114。

Research on metal bridles of pre-Qin period in Northern China

Shao Hui-qiu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 chun, 13001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pular date and area characters of the metal bridles of Pre-Qin period in Northern China, based on typology study of them, and compare with the materials from central plain、Xinjiang and Eurasia steppe out of the North China, we try to disclose the origins of these bridles.

Key word: Pre – Qin period; North China; metal bridle; Eurasia steppe

收稿日期: 2004—09—05

作者简介: 邵会秋 (1979 –), 男 (汉族), 辽宁普兰店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